

第 18 辑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第十八辑

(辛亥革命八十周年纪念专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辑部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丁如筠

责任校对：丁如筠

封面设计：王 鹿

版式设计：王丹丹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Guowai Zhongguo Jindaishi Yanjiu

第十八辑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发 行

经 销 处

太阳宫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625印张 271千字

1991年2月第1版 1991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册

ISBN 7-5004-0884-6/K·107 定价：5.30元

目 录

1 辛亥革命总评价	施乐伯 于之乔 樊书华译 冯钢校
22 论辛亥革命的理论 与实践	久保田文次 张 哲译
45 辛亥革命中的阶级和阶级斗争	Ю. М. 加鲁什扬茨 吴永清译
58 资本主义的发达与辛亥革命 ——以立宪派的“满洲市场论”为中心	野泽丰 张海英 李协京译
78 孙中山的“亚细亚主义”	藤井昇三 李吉奎译 马宁校
98 广东辛亥革命的考察	狭间直树 齐福霖译
123 辛亥革命在上海	M. 埃尔夫 王静 姚子照 刘学侠译
152 辛亥革命和内蒙古	M. 昂德唐 姚子照 王静译
165 乡绅与辛亥革命	市古宙三 迟云飞译
189 章炳麟的革命思想的形成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	近藤邦康 王玉平译

236	辛亥革命与日本	饭岛 涉
		赵宗颇 马洪林译
254	苏联史学界对中国辛亥革命史的研究略述	吴永清
270	英国殖民部档案中有关辛亥革命的资料	刘蜀永译
278	梅屋庄吉与孙中山、宋庆龄	藤井昇三
		齐福霖译
283	1979—1989年国外出版辛亥革命史论著 书目索引（英文部分）	樊书华编
304	（附）1979年以来台港有关辛亥革命论著资料索引	郭兴仁编

辛亥革命总评价·

施乐伯、于之乔

一、目前流行的观点

在详细地陈述我们对辛亥革命的解释之前，对史学界其他学者的一般看法，尤其是现在流行的观点作一番阐述，也许是有所裨益的。首先，我们将探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幸运的是，中国大陆研究辛亥革命的著作卷帙浩繁。这是因为，一方面，辛亥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家一般都这样称呼）一直是近年人们精心研究的课题；另一方面，我们已获得1981年在武汉召开的辛亥革命70周年学术讨论会的全部论文。

最初，史学界对辛亥革命性质的认识是一致的，几乎没有意见分歧。除了极少数人外，中国大陆的马克思主义学者都认为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时也承认，作为一个阶级，资产阶级在领导方面并没有起到主导作用。^①可见，学者们是根据革命目标——主要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进步的资产阶级和小

• 本文译自《近代中国及其革命进程：向传统秩序的不断挑战，1850—1920》[Modern China and its revolutionary process, recurrent challenges to the, traditional order, 1850—1920 (by Robert A. Scalapino and George T. Yu) univ. of Calif. press, 1985]的第六章的一部分，译文标题为译者所加。

① 见吴玉章等著《辛亥革命史》第2卷；朱宗震：《辛亥革命何时结束》，《近代史研究》。亦可参见1981年武汉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有关论文；李时岳的《近代中国的改革与辛亥革命》，黎澍的《有关辛亥革命几个问题的再探讨》，孔力、林金石、陈在政和郭聚合著的《华侨与辛亥革命》。

资产阶级势力”所追求的目标——来判断革命的性质。①当然，我们还应看到，即使以上这些势力，其成员也来自不同的阶层，他们的政治观点亦有显著的区别。②具体地说，革命的先鋒力量由以下三种势力构成：新军、秘密会党以及为数众多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其中大多数学生和知识分子刚从日本留学归来。每一势力心怀各异，难于形成统一的意见。对此，多数学者谈得很清楚了。此外，众多士绅（无论是在地方主义还是民族主义的旗帜下动员起来的）、商人—商会、农民和工人阶级，构成了以上这些有组织的团体的补充力量，他们普遍地加入了革命军队阵营。

没有真正的资产阶级，怎样才能进行这场“资产阶级革命”呢？（实际上是必须怎样进行的问题）对此，这些学者也作出了解释。虽然资本主义早已在中国有所发展，但十分缓慢，且极不平衡；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广大农村相比，资产阶级只不过是沧海一粟。在资本主义企业尚未得到充分发展的省分，最初的资产阶级只不过是地方士绅和官员，这些人还深受“封建思想”

① 我们应该注意到法国学者白吉尔的论文，她在《资产阶级与辛亥革命》一文中提出了不同于注①所述的中国学者的观点。白吉尔认为，虽然辛亥革命证明了资产阶级在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起着推动作用，而且这场革命也深刻地影响了这个阶级的命运，但是，这场革命仍不能称为资产阶级革命。她断言，即使在上海，商人的作用也是从属性的。

② 有关中国商人和企业家的演变的探讨可见黎澍《有关辛亥革命几个问题的再探讨》一文第35—36页。黎澍对日本一位马克思主义学者横山英的观点的评论很令人感兴趣。横山英的主要观点是：在近代中国，传统制度遇到了两种类型的挑战：一是广大群众，主要是农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这个斗争从太平天国运动开始，经过义和团运动，到五四运动达到顶峰；另一挑战是带有半殖民地半封建色彩的资产阶级斗争，其最典型的代表是西化运动，以1898年的改革和辛亥革命为标志。横山英认为，辛亥革命不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因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及其先辈是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强国的控制下缓慢产生的。

黎澍对这一论点进行了反驳。他认为，由农民、手工业工人和劳动者组成的“旧的政治势力”是与传统的封建经济相联系的，而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组成的“新的政治势力”，则是与新的资本主义经济相适应的；尽管新的政治势力还很弱小，“容易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妥协”，但是，他们的地位促使他们在农民的支持下，领导旧民主主义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国家独立、民主政治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斗争”（第4—6页）。但是，黎澍最后认为，主要是同盟会所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使辛亥革命取得了成功。

的影响。^① 资产阶级的大多数先进分子主要集中在上海，因此，这个极端西化的城市的资产阶级为革命事业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持。^② 其他一些城市的商人和企业家虽然也为革命作出了贡献，但就全国范围而言，要获得资产阶级持久的、协调一致的支持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革命一开始，分裂的过程也就开始了，各省及各大城市都分别处于不同的社会上层人士的暂时控制之下：有的由起义的新军领导；有的由秘密会党领导；还有的受政府官员领导，他们得到地方士绅和商人的支持，实际上却伺机宣布“独立”。

从以上分析来看，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很容易弄清楚的。作为一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力量还太弱小，无力进行自己的革命。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他们还不完全具备作为一个阶级应有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他们对官员阿谀奉承；为渴求法制和秩序而不惜付出任何代价；为避免冲突而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这一切都说明，封建意识还在影响他们，使他们不可能完成领导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历史使命。孙中山和黄兴领导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了讨伐袁世凯，于1913年发动了“二次革命”，但是，资产阶级的绝大多数却拒绝给予支持，这不仅表明辛亥革命最后以失败告终，而且也是资产阶级软弱无力的最好例证。^③

然而，中国的某些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近代中国的历史问题比较复杂，辛亥革命之所以迅速遭到失败，还有其他的原因。吴玉章等认为，虽然新军充分地代表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农民和工人的利益，接受了革命思想，而且事实表明他们是革命最初

① 参见孔力等著《华侨与辛亥革命》第4页。这些作者对华侨与土生土长的中国资产阶级进行了明确的对比，前者由于其所处环境而受到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正面影响来自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反面影响则来自种族歧视。后者的上层主要来自“大地主、大商人、官僚和政府官员”。曾友清的《在美华侨与国家革命，1894—1912》一文也从不同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

② 有关武汉和广东商会作用的论述，可参见皮明麻的《武昌起义时的商会与企业组织》和乔茹的《广东商人与辛亥革命》。

③ 例如赵矢元的《二次革命与辛亥革命》便持此论。

取得成功的主要力量；但它显然不是由革命者建立起来的一支军队。^① 它的指挥大权仍然掌握在满清军官手里，因此，即使在华南，最终也未能把它改造成一支革命队伍。由于北洋军队仍然是袁世凯政权的工具，因此，随之而来的军事和政治对峙也就不可避免。

可以想象得到，在谈到中国革命未来的进程时，中国有些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总是一贯强调乡村阶级，尤其是农民的作用。他们认为，在中国，有发动农民的基础，1911年以前自发的“群众斗争”虽然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阶级冲突，但是，它们有助于削弱满清政府的统治。^② 发动农民的组织是秘密会党。蔡尚清认为，这些秘密会党是由贫苦农民、手工业工人和无业游民（流氓无产者）组成。^③ 他的这一观点得到了许多同行的赞同。这些会党作为互助社活动，普遍地存在着反满情绪。

孙中山本人很早就认识到了秘密会党对于革命的极端重要性，并已与它们密切合作。但是当革命最终爆发时，经过最初的一些合作后，“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转而反对秘密会党，他们镇压农民起义、屠杀会党首领、放弃有益于贫苦农民阶级的政策。^④ 因此，学者们认为革命者脱离了群众，失去了他们的支持。

从这些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在以后一个时期史学界中很有影响的观点，即在中国有必要进行一场“资产阶级的革命”。如果说中国资产阶级既不具备强大的革命力量，也没有坚定的信心来完成“他们自己的革命”，那么资产阶级革命这个任务必然落在另一个阶级的肩上。不用说，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前提条件，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通过成功地发动农民，无产阶级第

① 吴玉章等著《辛亥革命史》第2卷，第292—295页。

② 如前所述，关于这些起义的详细论述见吴玉章等著《辛亥革命史》第2卷，第341—317页。

③ 蔡尚清：《论辛亥革命与秘密会党的关系》。

④ 同上，第12页。

一次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它不久就注定要成为革命的先锋力量，承担起完成产业资产阶级革命这一使命。

中国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为了使自己的分析更加充分、论述更加灵活、结论更加客观，他们不断地努力，但是，仍然克服不了源于西方的简单化的阶级结构分析模式的局限。例如，就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历程和它当时的要求而言，有人认为它能够或者应该具备西方资产阶级那一套价值观；这种假设只是人们企图运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方法去研究中国历史时所出现的诸多问题之一。

在我们对辛亥革命作出评价，对其内涵作出界定之前，对西方学者西达·斯科克波爾的新作^①进行分析研究，将是很有必要的。斯科克波爾在她的研究中，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革命进行了全面的比较分析。她一开头就表明，她的目的不在于提供新的资料，而在于以新的方法对现有的资料进行整理。因此，我们要评论斯科克波爾的著作，首先必须分析她是如何选用资料的；其次，也是最终目标，就是对她的方法论的前提和理论前提作出评价。

正如斯科克波爾自己所述，她在进行这项研究时，知识上主要受惠于巴林頓·穆尔；同时也深受马克思的“社会发展阶段论”和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关于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简化论的影响，尽管这两种理论都受到了批判。马克斯·韦伯对斯科克波爾的影响也清晰可辨，尤其是她论述国家建设时。

斯科克波爾运用以上这些大家的理论，提出了下面几个命题来论证她的观点：第一，在所有实际上获得成功的社会革命中，农民起义是最重要的因素；第二，阶级斗争是任何一场革命的中心；第三，当时居于主导地位的国际局势，对革命来说，既是一种挑战，又是一种催化剂，对革命的成败起着很重要的影响；

① 西达·斯科克波爾：《国家与社会革命：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

第四，革命的结果完全可以通过革命后新出现的政治制度进行研究而作出评估。

尽管我们曾建议对中国、日本、俄国和法国作某些比较研究，这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和近代中国的革命是很重要的，但我们在这里将主要限于讨论斯科克波尔对1911年以前的中国所做的分析；然后我们还将以同样的方式把我们得出的某些结论与斯科克波尔的结论进行比较。

斯科克波尔的主要论点是：法国、俄国和中国这三个传统社会在本质上是相似的；“这三个古老的政权都出现了政治危险，这是因为，资本主义造成了世界的不平衡发展，引起了逐渐升级的国际性军事竞争，而这三个社会中的农村土地所有制结构却阻碍或者束缚着君主政权采取有效的对付措施，从而威胁并冲击着原始的专制国家机器和官僚国家组织”。斯科克波尔认为，德川幕府时期日本的情况却有所不同，这主要是因为日本缺乏一个在政治上强有力的地主上层阶级。^②

我们研究的这三个传统社会，它们之间究竟有多少相似之处，又存在多大的差异呢？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相似和差异意味着什么？显而易见，关于这个问题，目前存在着意见分歧。当然，在这三个社会里，结构上存在着某些明显的相似之处，其实，几乎所有的传统社会都存在着这些相似性。但是，这三个传统社会之间又存在着差异，而且大都不是结构上的差异；主要是由于这些结构的差异决定了中国革命各阶段的起始、原因、领导权和结局，使中国革命有别于俄国革命，其差异比我们通常所认为的要大，也使中国革命在性质上不同于法国革命。斯科克波尔强调指

① 西达·斯科克波尔：《国家与社会革命：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第9页。

② 见斯科克波尔的《国家与社会革命：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第101页。她认为，武士领导了日本的明治维新，他们的权力主要来自他们在长州和萨摩的采邑有着独立的经济收入，但是，由于他们不是地主，或者与地主无密切的联系，“任何东西也阻挡不了这些人在政治上采取中央集权的方针来拯救国家”（第192页）。

出，一个社会发生革命时，在特定时间里，与内部环境相关的外部环境（地区性的与全球性的）的变化，对于革命的成败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这一观点是很正确的。但是，斯科克波尔只是关注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强国在经济上的掠夺和政治上的侵略这种外部威胁对革命所产生的重要影响，而忽视了外部环境的积极因素对革命所产生的同等重要的影响；中国国内力求改变现状的知识分子却认识到了这一点。

斯科克波尔认为，“土地所有制结构”使中国君主政权在国内不能进行改革，又不能采取有效的措施对付外国的挑战。她的这种主张对于阐述中国社会发展缓慢的根本障碍和中国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是毫无帮助的。如前所述，中国面临的最根本的困境主要是心理上、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问题。心理上的困境主要表现为，在中国的传统思想和文化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中庸思想，所有社会杰出人物都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政治上的困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中国的知识分子缺乏反抗精神，受封建传统国家的束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第二，在中国，没有出现一个象西方教会那样的对立组织所代表的政治上的抗衡力量；第三，在现有的西方模式中，难于找到一种有效的模式来代替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合而为一的制度，这种合而为一是中国传统政治秩序的特征。经济上的困境主要表现为，在精耕细作的农业传统体制下，生产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同时，连年和平使人口持续增长。

除上述因素外，还存在其它一些原因：第一，满族的君主统治并没有成为民族主义的象征，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由此产生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第三，知识分子出身的官僚阶层迟迟没有认识到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上三点基本上包括了最根本的方面，这对于我们理解近代中国历史上最初所发生的革命是很有帮助的。虽然斯科克波尔附带提到了其中一些因素，但在以农民起义为基础的阶级结构分析中，她不

可能对以上这些因素进行充分的论述。

关于日本明治维新和19世纪中日两国的本质差异，我们已在别处进行了分析。中日两国的这些差异并不在于德川幕府时期日本缺乏一个在政治上强有力的地主阶级。明治维新时期，不管富裕的平民如何侵占土地，绝大多数土地仍然控制在军人阶层手中，虽然这些军人自己并不耕种这些土地，许多中国士绅的情况亦是如此。政府通过巧妙地采取养老金制度剥夺了军队上层人士手中的封建权力。但是，除了某些例外，前军人阶层对土地所有权仍恋恋不舍，明治初期的情况即是例证。

应该记住，在德川幕府时期，日本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这个遗产对以后日本社会的发展是有影响的。日本的起义者们最初为了保留这个遗产，驱逐蛮夷，决定团结在天皇的旗帜之下。这是适应日本历史环境的政治选择，对未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治维新初期的一些领袖和支持者们后来发现他们的运动正在改变方向，便以地方主义或“自由”为名举兵反叛，这与1911年前夕中国士绅的行动类似。但是，运动发展到此时，东京的主要领导人看问题的观点与他们作为有采邑的起义者刚刚要求政治权力时的观点不大相同。他们开始奉行的路线，不能简单地解释为政界名流与土地所有权之间关系的产物。在他们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关键的因素在于他们没有从政的经验，对他们所面临的现实抉择该作何理解；另外还有一些使日本有别于中国的因素，如国家的面积和人口的多少、政治结构以及借鉴他民族文化的悠久遗产，也是影响他们制定政策的重要因素。

斯科克波尔把辛亥革命看作“上层阶级”反对清政府的起义。她没有把它称为资产阶级革命或农民起义，这是很正确的；她认为，自从太平天国起义以来，尽管一直存在着农民起义的可能性，但是，只是在1911年以后才开始了农民起义。不过，斯科克波尔的阶级分析方法仍不能令人满意。辛亥革命既超出了“上层阶级”起义的范围，又够不上“上层阶级”的起义。从阶级的

角度而言，反清运动包括了各个不同的阶级，涉及到各种不同的问题。同时这种情况也反映在各阶级内部的尖锐分裂上，尤其是传统型的社会名流内部。事实上，阶级内部的分裂较之阶级之间的分裂，对辛亥革命产生的积极作用更大。

阶级结构分析所揭示的一个结论就是：革命后所发生的一切都是既定事实造成的必然结果。所以，斯科克波尔屡次指出，在法国、俄国和中国所发生的一切，绝不可能在其他任何地方重演。这就是说，偶然事件、机遇运气、人的决定对革命毫无影响。然而，在现实的历史进程中，包括革命在内，以上这些因素却总是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事实上，历史学家或社会科学家所面临的^①最大难题之一，就是要分析、判断领袖的决定在什么时候会使革命局势完全改观，评价偶然事件或机遇运气到底有多重要。他们的任务是要说明：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革命有可能发生，或者比较有可能发生，或者极有可能发生，或者不可避免；在什么时候和什么环境下，这种高度可能性、较大可能性或者可能性又会减小。

二、对辛亥革命的解释

在本章开头，我们提出了两个论点：第一，社会革命通常是一种进程，其间可能包含也可能不包含政治革命；第二，尽管辛亥革命最初结果是消极性大于积极性，但是，它仍是中国蓬勃开展的社会革命的一个阶段。

任何形式的革命都有一个复杂的酝酿期和其后的条件成熟期；在这个过程中，导致革命发生的诸多的关系仍明显地起着作用，同时出现更为复杂变化的机会也在逐渐增多。^①在许多情况

^① 在论述革命的各种专著中，我们发现克兰·布林顿早在40年前首次出版的经典性作品和查默斯·约翰逊的近作（1982年修订本）极富启发性。虽然我们也提出了某些新的、完全不同于他们的观点的结论，但我们的某些观点深受这两位同仁的影响。

下，革命都有可能流产：第一，革命者出现失误；第二，企图维持现状的势力有所加强；第三，形势发展的步伐比较缓慢。而且下面这种情况也是可能（或者很有可能）存在的：革命目标不能在其所要变革的社会内部实现，至少在其发展的现阶段是如此，或者是为了实现革命目标而选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并不能为上述目标服务。此外，在非常重要的各个战略关头，某种完全未曾料到的情况或偶然事变可能发生，从而改变革命的整个进程，即使革命仍向前推进。最后，外界的干涉对革命也有影响，或者使革命遭到失败，或者援助革命。

在试图辩明日益成熟的革命条件时，我们应看到正反两个方面的迹象。在反面的迹象中，我们将列举五种特别突出的情况：第一，平息不满的各种程序和方法原为人们所接受，现在却遭到失败，逐渐失去了效力。而且以前能消除冲突、产生凝聚力的那一套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如今也摇摇欲坠。第二，对于国家赖以合法存在的价值体系或思想理论，重要的社会团体表示怀疑，并拒绝服膺。第三，对于君主、独裁者、总统或寡头的个人专制，人们已越来越淡漠，或者公开表示反对。第四，社会名流内部日益产生的分裂已初露端倪，而他们本来是现有统治秩序的重要支柱，这样，现有的政治制度就愈来愈容易受到“内部”和“外部”的夹攻。第五，军队警察保安力量和知识分子团体这两大社会集团内部的分裂尤其引人注目，前者对国家实行强制性的权力来说，举足轻重，后者则是国家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支柱。

当然，这些反面迹象受该国家或该社会所面临的内外力量的影响。譬如，在经济领域，如果在普遍的持久的发展之后出现衰退，政府常常就会陷入最危险的境地，因为衰退使人们产生一种相对的失落感或挫折感。（这是事件的转折点，至少它可以影响“群众”，同样也会影响社会名流，尤其是其中虽然地位较低，但很容易跻身上层的部分。在政治方面，由于与外界的联系和交往，一种有吸引力的新政治模式的出现为新思想的产生和新制度的建立

提供了可能性，从而消除了人们心理上的禁锢，这种禁锢源于因环境的异常恶劣，人们觉得无路可走。事实上，任何一场真正的革命，通常必须具有外部力量的推动。

革命条件的正面迹象包括哪些呢？毫无疑问，领袖人物是一个可变因素。要想做出高度的概括，对各类重要的革命领袖都进行分析，就好像是研究一个变化莫测的事物，因为他们各自所具有的特定的文化、所选择的特定的时机以及所领导的特定的事件，对于革命的成败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过，大多数革命领袖又有着某些共同的品质，这是很明显的。他们都热烈地、坚定地追求所选定的目标，怀着不可战胜的乐观主义精神和用通常所说的“领袖人物超凡的感人魅力”来吸引和驾驭大批追随者。这种对他人的驾驭靠的是情感的、迷人的感召力，而非理性或理智原则。以上这些并没有完全包括革命领袖通常所具有的品质，甚至并没有触及到某些领袖所特有的独异性格。但是，我们应该充分注意到，在分析一场革命时，我们不能只探讨非人力因素，不管这些因素是意识形态还是国家政治结构。领袖人物能力的差异能使革命的面貌完全改观，即使每位领袖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时代的产物”，即使有时事实上并没有“伟大”领袖出现这样一种说法仍然是正确的。

组织问题是影响革命成败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可变因素。没有长期的艰苦的组织工作，任何一场革命几乎都不可能取得成功。这些组织工作通常是指建立强制性的机构和舆论宣传组织，虽然某些组织的活动主要是依靠血缘关系、共同语言或老乡观念。如果认为革命的组织工作仅仅靠热情献身和理智服从的“真正信仰者”的努力，这就大错特错了。^①“真正信仰者”只是构成了一个不可或缺的坚强核心，但还必须有一个更大的、影响范围更广的软核心。他们参加革命运动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有的出于

^① 埃里克·霍弗在其名为《真正的信仰者》这部出色的论文集中，非常清楚地描述了任何一场运动的核心支持者所具有的各种特征。

个人忠心，有的是投机取巧，有的则是听人劝诱。事实上，即使在坚强的核心中，这些动机并非不存在。此外，这个软核心必须向外扩展，争取使社会中相当多的一部分人在政治上保持中立或持消极观望态度，拒绝给当权者以支持。革命与所有形式的政治一样，需要政治联盟。通过建立一个较其对手的联盟更为强大的联盟（尽管没有必要更大），革命就会取得成功。毫无疑问，这个联盟将包括显赫的旧时社会上流人物和容纳其他不同的势力。他们中很多人认为自己被剥夺了权力或受到了压迫，会参加革命的。

上述这些论述丝毫没有否认革命纲领和思想理论的重要作用，相反，这也是影响革命成败的又一个重要的可变因素。那些还未取得政权的领袖和团体，他们从前还没有妥协、失败或成功的经历，因此，他们不会因以前的妥协而后悔，因失败而灰心，因胜利而忘乎所以，他们有最好的机会去制定自己的一套新政策，确立一套完善的价值观念，以吸引更多的追随者。他们发誓清除昏庸、腐败、无能等陈旧恶劣的作风，提出新的目标，并建立起实现这个目标——诸如使全体人民富裕和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等——的一套新机构，这样他们就会获得许多团体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支持，因为年轻人怀着美好的理想，尚未经历生活的磨炼。

有了强有力的领导、认真细致的组织工作和一整套吸引人的新纲领，革命运动就有了成功的最大可能。尽管如此，如果当权者清楚地意识到了革命者的挑战，如果他们有能力采取有效的对策，或靠自身力量，或通过外部势力的援助，那么，他们仍有可能将革命镇压下去，即使这场革命运动具有雄厚的财力资源。

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可能性存在。一种就是相对弱小的革命势力，可能会暂时战胜一个更为软弱的政府，但最后革命仍会遭到失败。结果，或者很快会引起革命后的倒退，造成持久的混乱，或者带来某种新的停滞。

无论出现哪种可能性，当政治革命达到高潮时，它通常循着